主题：刘守英（20190905上午）

时间：2019年9月5日

地点：中国人民大学

刘守英：我今天讲的主题是一个结构问题，转型的时候，最主要的就是结构，有很多讨论结构问题的角度，我觉得最重要的角度就是一个国家怎么样从乡到城。任何一个国家在起飞的时候都是一个乡村社会，但是这个乡村社会怎么转向城市社会，这是现代化的一个基本。所以我今天讲的主题就是城乡转型的政治经济学，因为我现在到了经济学院，所以经常会带上政治经济学这个词，我们的整个主业也是政治经济学，我的基本观点是中国一些重大的问题是政治经济问题，政治经济的问题核心是什么？核心就是一个国家的经济运行中，政治和经济怎么互动的问题，这是我自己的理解。在我们整个重大的政治经济问题当中，城乡转型时是最重大的问题，它是政治经济学的问题。今天给大家讲的主要内容分五块，第一是怎么理解城乡转型成为一个政治经济问题。第二是中国从近代以来从一个乡村社会转变为城市社会的进程，所遇到的一些困境。第三是针对费孝通先生提的乡土中国，我提出了一个概念叫做中国目前已经到了城乡中国的大的格局。第四是成型中国的格局下，城乡振兴的路径是什么。最后是讨论一下政策和制度问题。

城乡转型的时候，能够找到的理论依据就是发展经济学，发展经济学跟新增长理论最大的分裂就是结构问题。当大多数的主流经济学家从50年代开始关注穷人问题的时候，尤其是发展中国家问题的时候，当时面临着最大的问题就是新古典的假设和发展中国家的基本问题，这里最大的问题就是任何一个发展中国家都面临着从农业经济向工业经济的结构转变，这是主流发展经济学家对发展的定义，新古典讨论的是主流问题，但是发展经济学问题讨论的是结构变迁问题，结构变迁问题的核心是研究一个国家如何从一个农业经济向工业经济的转变，这样就产生了一批的发展经济学家获诺贝尔奖，比如林毅夫老师现在还在做梦，我开玩笑跟他说是不是还有希望？他说没有希望，我说那你还忙什么？所以他也是从结构的角度上来讨论发展问题。这里的问题在哪？实际上是把整个经济变迁的过程拉长来看，任何一个国家都是发展问题，所有的发达国家，最初也是从一个乡村社会变成一个城市社会，也是一个发展问题。这里有一个问题，仅仅讨论一个国家从农业经济向工业经济的结构变迁，是不是就到此为止了？为什么很多发达国家可以从一个农业经济向工业经济转变，大多数的发展中国家战后并没有成功地实现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转变。所以我提出的第一个误导就是把结果告诉了所有的发展中国家，但是过程怎么实现没有告诉他们，这是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这样导致的结果就是大多数的发展中国家说，只要我通过各种手段，各种政策进行农业经济向工业经济的转变，那我就是发达国家。所以并没有成功，原因就是发展的过程没有告诉你怎么实现工业经济向工业经济的结构变迁。

第二，我要严重批评的就是关于农业份额下降的问题。我们讲发展问题的时候，一个问题在整个结构转变的过程当中，最主要的两个理论就是发达国家的结构分析，都是农业份额的普遍下降，这里有两个下降，一个是占GDP份额的下降，第二个是就业份额的下降。所有的发达国家在结构转变的过程当中，农业占GDP和就业的份额都普遍下降，这是发达国家的基本规律。这个基本规律，世行副行长的做了世界发展中国家的标准模式，标准模型的结果就是一个国家要实现工业化的进程，农业份额必须下降。但是这里有几个误导，第一，世界各国在农业份额下降的过程当中，产值占GDP的份额和就业占整个就业的总份额的下降是不是同步的。世界各国事实上并不存在两个份额下降的现象，因为各国的资源禀赋是不一样的，各国农业现代化的路径也是不一样的。比如日本在整个工业化的过程当中，就业的份额也下降，但是就业的份额下降是远远低于GDP下降的。世界各国找到的共同规律有一个规律是相同的，就是农业占GDP份额的下降，但是农业占就业份额的下降不是一致的。第二个误导，我们讲发展结构转变的时候，大家都只讲农业份额的下降，所以给出的结果在发展政策上普遍采取的就是降低农业重要性的分析，这里就包括减少农民，包括整个发展政策里对农业的忽视。背后的逻辑就是共同规律里面的第二条，所有成功实现现代化的国家，在农业份额下降的同时，农业是发生要素的重塑，农业的竞争力是提高的。美国的农业GDP才占1%，就业占1%，但是美国在两个份额下降的过程当中，农业的竞争力是增强的，比如我们用农业交换他们的工业品牌。第二，在两个份额下降的过程当中，农业变强了。所以，所有的国家不是说你份额的变化，农业就变得可有可无了。

第三个误导就是何为工业化，所有的发展给出来的基本建议就是说一个国家要从穷变富必须要工业化，只有工业化，才是这个国家实现现代化的唯一路径。但是问题是什么是工业化，在理解工业化的问题上有三个重要的误导，第一就是把工业化简单地当做产业，或者说农业、工业、服务业，简单地把整个工业化过程当做一个产业。当做一个产业的话，搞农业就是种地，牵牛耕田。工业就是在工厂里面做事。人类社会工业化最重要的是生产要素组合的变化，这是工业化的本质。所以农业社会的产业有农业也有工业，但是问题出在你在农业社会是简单的要素，没有发生各种生产要素的组合，所以，工业化的本质在哪？发生在整个工业过程当中，各种生产要素的组合和转型升级，其中包括大家讨论工业革命的技术进步，但是技术进步也是组合的一个要素，还有企业家，还有各种常规生产要素。工业化本身不是简单的产业，第二，工业化更多的是制造业，如果我们讲工业化是各种生产要素的组合，但这个生产要素的组合，只要在任何一个行当里面发生了生产要素的组合，就是工业化的过程。所以这个工业化的过程，可以在制造业里发生，也可以在农业里发生，可以在城市发生，也可以在乡村发生。当工业化是各种生产要素组合的时候，工业化就不简单的是制造业了，它可以是农业的工业化，可以是服务业的工业化，所以工业化的本质是生产要素的组合。第三个就是一个更大的误导，一个国家的产业，农业先转向制造业，制造业到了一定比重就转向服务业，这也是一个误导。我们去下面调研，地方领导吃饭的时候还很客气，说我们坚决按中央科学发展观办，就是先把服务业搞上去，但是那个地方从来就没有工业，所以那个地方非常穷，服务业远远超过发达地区很多的产业结构，但是他说你看我服务业的比重很高，我是不是就是一个很先进的经济了？

这里的问题出在哪里？对工业化理解上，你街上都是摆小摊，没有工业化的结合，没有生产要素的组合，你的产业就是落后的。所以，我们在整个发展理论里，第三个非常大的误导就是对工业化简单的理解。第四就是把城市化率的高低，作为发展绩效的唯一的指标，我们说你这个国家是先进的还是落后的？落后的就是乡村社会，先进的就是城市社会。城市社会的标志是什么？就是城市化率的高低，但是这里的问题在哪？城市化率可以作为一个国家唯一的指标。比如说我们这次去墨西哥去调查，墨西哥有60%的城市化，现在可能到了80%，还有我们隔壁的小兄弟北朝鲜，心里也是80%的城市化率。城市化率可以证明它是发展绩效的指标吗？你的城市化率可能很高，但是你的贫困问题可能很严重，社会的暴乱肯定也很多，但是现在你可以证明你的发展绩效是好的吗？所以我们从90年代中期以后，我们说一个地方要干什么？要建城，市委书记的主要任务是提高城市化率，我们现在已经疯狂到了这种程度，我们现在为了把城市化率提高，把原来的区县改成市区。所以我们40%是靠改出来的，城市化率达到了60%，但是这有什么意义？所以我觉得，整个新古典的发展理念，在讨论结构问题的时候，这四个误导的结果就是我们简单化地理解一个社会结构转变的过程，从一个农业社会转为工业社会，从一个乡村社会转为城市社会，这样的话就是把整个发展的目标简化为唯有工业、唯有城市是先进的，农业和乡村是落后的。发展政策呢？尽一切力量把工业搞上去，尽一切力量把城市搞上去，对立面就是农业消灭掉，乡村消灭掉。

所以整个中国城乡转型的过程，从农业经济转变为工业经济的整个结构事实来讲，跟所有的国家是一致的，就是在结构转变的过程当中，农业的份额不断地下降，农业份额不断上升，这是一个基本问题，这符合所有国家的。但是我们出现了三个反事实，第一个事实是我们在整个农业产值份额下降跟世界趋同的过程中，但是我们留了一个过大的农业就业，有极少数的国家在整个农业份额下降的过程当中，它的产值份额下降，就业份额下降没那么大，但是我们的问题是什么？跟全世界各国结构转变中的最大的反差，就是当我们整个农业的GDP的份额降到7%以下，就业份额还是将近三分之一，这是我们的反差。也就是说，我们在整个结构转变的过程当中，我们农业的GDP份额已经没有那么重要了，但是我们在整个农业部门还藏了太多的就业份额，所以这样就导致你的农业不可能饱和，这是一个反差。

第二个反差就是两个城市化率，你研究发展问题的时候，大家都讲有正式部门，有贫民窟。但是我们出现了两个城市化率，第一个城市化率是户籍人口增多，第二个城市化率就是常住人口城市化率，常住人口城市化率怎么统计出来的？一个人在一个地方待六个月，你没有享受到城市的红利，尤其是教育，但是他也算是城市化率。你可以说这里有很多贫民窟，有很多不好的住房，但是没有说这个人跟我的城市无关。所以我们整个城市化的进程就出现了户籍人口和常住人口城市化率之间产生了将近2.5亿人口，这些人到底是农村人口还是城市人口？第三个反差，所有的国家在结构转变的过程当中，农业是变强的，基本标志就是农业的回报率高，留下来搞农业的人，他的收入不比城市的低。第二，留下来搞农业的人，在农业的回报比其他行业要高。现在有很多人说农村是因为人老了，但是你怎么就没有问留下来的老人做的农业行业，如果行业回报不高的话，这个行业怎么有希望？所以所有的发达国家在结构转变的过程当中，农业的报酬是提高的。我们从90年代以来，结构转变加速，工业化和城市化的速度加快，但是农业成本利润下降了，就说明这个农业是越来越弱的，那谁会去做农业？所以这三个反差我们要反思，中国从一个乡村社会转变为城市社会的过程当中，如果是自然演进的话，跟所有有同样事实的话，那就没有反思了，你就是一个自然演化的社会。但是类似于中国这样的社会，从乡村转向城市的过程当中，为什么会成为一个问题？我们经常讲的所谓的三农问题怎么会成为一个三农问题？根子在哪？我自己认为，简单的讨论或者我们回到前面发展经济学，简单地说，发展就是一个从农业向工业经济的转变，更主要的是你采取什么工业化和城市化的方式，不在乎你整个农业的份额是多少。一个国家城乡问题的根源在哪？在方式，而不是不高的问题。所以你采取什么样的工业化和城市化的方式，城乡转型的结果和行为就不一样，这是问题的本质。

所以，我们在讨论城乡转型的时候，第一个给大家提的是什么？我们一定要从过去简单的关注结果，转向关心它的方式和过程。我们的发展过程当中，是以一切手段来实现工业化和城市化的，但是最后我们在城乡转型当中产生了三个政治经济问题。第一个问题是将工业化和城市化等与现代化，农业就是一个服务和从属的位置，如果我们觉得只有工业化和城市化就是现代化的话，那农业就是一个从属的地位，所以大家看我们搞了几十年的农业问题，为什么农业问题越来越大？根子就在于我们的发展理念上觉得你一个国家只要把工业化和城市化完成了，农业问题是迎刃而解的。也就是说我就是一个弱势群体，到年底总结的时候肯定是人家搞区域，搞宏观，搞增长，我进的时候就快吃饭了，我就会说那些你都知道了，我就不讲了，年终分钱的时候说你这些事不用说了，给你补贴一点就行了，是不是跟农民差不多？原因就在于，大家都觉得工业化和城市化完成了以后，现代化就完成了。所以，农业的角色是什么？你帮着我把工业化、城市化都干成，你自己要不要现代化再说。另外就是你是从属的位置，这是第一个政治经济问题。第二个政治经济问题就是农民的他者地位，所以中国的三农问题，就是农业农村和农民，但是实际上我们在决策层的核心是直观性农业问题，原因是这样，农业是提供粮食的，农业给谁提供粮食？给城市提供粮食。所以这样的话，我们的三农问题的顺序第一位是农业，所以我们这几天都在讨论猪肉问题，我特别清楚，什么时候总理会到新发地看猪肉市场？那肯定是猪肉价格上升以后他才会去看，至于养猪亏没亏，他不会去看。原因就在于肉的价格关系着城市的稳定，但是你养猪亏不亏是在乡下人的事。所以农民在我们整个发展过程当中就是一个他者，他自己没有主体性。所以你看我们在集体化时期，你就是给城市种地种粮，到90年代以后城市化加速。城市化加速，农民的角色是什么？你先在家里种地，没钱了再去城里加工，加工以后再回去，他是他者地位。第三个政治经济学问题就是乡村和城市两个空间，我们只有城市空间，没有乡村空间，所以大家到了北京，北京就是这么点空间，你走出去以后就是乡村了，但是决策的过程想的是这一块。至于乡村在城市决策过程当中，这个空间是不被考虑的。这样的结果是什么？本身我们从地理学讲了这是两个空间，而且乡村本身的空间更大，但是在发展问题上，大家考虑的是城市。所以为什么在城乡转型？城乡转型是一个自然流动，是一个没有任何被干预的过程。正是因为我们工业化和城市化的方式，最后就产生了三个政治经济学问题，所以，城乡转型是一个重大问题，这个重大问题是一个政治经济学问题。

第二，中国的转型实践。中国的转型实践跟所有的发展经济学讨论发达国家的问题，我们就是我们有我们的独特性，所以我们讲，政治经济学的核心问题是找出中国的特殊性，中国哪里是不一样的？找到不一样，才能进行分析。中国的转型实践，跟发展经济学讨论结构转变的时候有一个非常重大的差别就是我们是有体制因素的，不是简单的结构转变，不是简单的从农业变成工业，我们用什么样的体制实现从农业变成工业的转变，这是我们独特的地方。所以我们在体制转变的过程当中出现了两件事，第一你是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农业向工业的转变，就是社会主义体制下的农业向工业的转变，这就决定了整个中国的转变，跟其他体制下的结构转变进程不一样。第二，我们在结构转变的过程当中，体制和结构转变之间的不匹配，表现在哪？表现在我们改革以后，中国已经意识到了体制问题必须要长期化，所以大家看，我们改革以后提出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道理是什么？道理就是避免在体制上的全过渡，避免通过过急的制度上的改变，造成对整个生产的破坏。所以，我们体制上的探索是往前走的，提出了初级阶段，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但是我们在结构转变当中是从来没有变化的，从哪开始？整个结构转变的过程，基本上就是毛主席在七届二中全会上宣布中国从一个工业国变为一个农业国，从那个时候开始到现在为止，整个中国的结构变迁过程，基本的方向就是快，越快越好，越快将工业国变成工业国，我们就觉得我们是现代化国家了。这样就导致我们整个改革以后在体制上相对稳定，但是在结构上还是追求快，这样节形成了体制跟结构转变两者之间的不匹配，这是整个中国转型实践非常独特的地方。

所以，城乡转型的政治经济学分析，重点要研究两个问题，第一，不仅仅是研究结构变革本身对城乡转型的影响，重要的是研究结构变迁的方式如何影响城乡关系。第二就是研究我们的体制和体制的变革对城乡转型的影响，这是政治经济学必须要回应的两个问题，我前面讲了分析的视角，为什么城乡转型是一个政治经济学的问题。

第二是乡村转型的困境，中国从近代以来，各代的仁人志士就是一个目标，怎么样改变乡土中国，怎么样将中国从过去的传统的农业社会变成一个现代工业。这里的核心在哪？一个乡土中国，要转型为一个现代中国的难度，难在如何从人类的乡土结构里面拔出来，原来你是一个乡土结构，但是这个乡土结构要拔出来成为一个现代的结构很难。所以这样的话，在整个中国转型的过程当中，乡土中国的特性是什么？这个问题我们在结构变迁的方式和体制的转变上，就会有很多的麻烦，我觉得根子出在这里。所以我先给大家简单讲一下什么是乡土中国，你想清楚这个事再说。

第一个特性是我们基本上忽略掉的，就是乡土的结构到底是什么样的结构。中国在近代的时候，有三派在如何改造中国乡土社会有着针锋相对的观点。八国联军进入中国以后，当时中国的问题是救亡的问题，救亡问题的主战场在哪？乡村，如何以乡村为主战场在救亡的时候，实际上有三派观点。第一派观点，就是大家看到门口挂着的吴井昌先生，他说要使中国从一个乡土社会救亡，最主要的，根本的方式就是建立工业，将农民从乡村移到城市。第二个观点是梁漱溟乡间派，他说这个农民太愚昧，整个生活方式太落后，又不识字，组织方式也很落后，于是教他们知识，教他们运动，这两种是干预行为。第一个是移走，但是你移得走吗？第二个，这个农民你说他愚昧，教他识字。但是干预以后，刚开始大家都挺感兴趣的，有一个书记说，刚开始是挺热闹的，一波知识分子唱着歌就来了，大家都很新鲜，教农民识字，这也挺开心的。后来遇到一个事情，那个农民不打农药，虫子到处飞，这个农民开始怀疑了，不打农药产量就下来的，怎么防虫？农民开始不跟他走了。他自己边上的地上还在种着，还是不打农药，不打农药虫子就飞到农民的田里了，说你这个不行。原因就是说，这种外力进入乡村以后，如何跟乡土本身结合。所以费先生讲，你要改造乡村，首先要认识乡村的社会结构，乡村本身是有结构的，这个道理也很简单。中国几千年不都是这么过来的吗？农民到底是怎么过来的？你要想明白这个道理。比如我们搞扶贫也是这样，我来学校之前最后的一次扶贫对我的启发也很大。我当时在云南做精准扶贫的评估，当时很着急，农民坐在门口，家里家徒四壁，门口一片大的湿地，还有鸭、鹅带飞，我问他题为什么不干点什么？那个农民看了我一下，又去听他的小曲了。我说你把房子收拾一下，人家看了我一下又继续忙去了。原因是他在他的结构下生存，你问他为什么不干这个事，他归说我为什么要干这个事？你要想明白这个事，他们就是几千年这么过来的，没有折腾，是你们来折腾我。

首先什么是小农经济？小农经济实际上是靠着自己一方面的农业，第二是家庭手工业的结合，然后勉强维持不饥不寒的小康生活，当然不是我们现在的小康，我们现在的小康不是这样的，所以农民怎么样维持不饥不寒的小康生活？当没有外力借助的时候，农民是靠农业和手工业的结合。整个乡村的结构第一是农民以农业为主，兼具工匠的角色。农民不简单的只是一个种地的人，比如我们在乡村，我们最希望过春节，因为春节的时候我们可以请裁缝来家里做衣服，裁缝到家里做衣服可以吃肉，农民当中有做裁缝的，有木匠，有铁匠。农民既是搞农业的，也是一个工匠。所以，乡土经济是一种农工混合的经济，不只是单纯的农业经济。家庭工业、作坊工业，这些乡村工业跟农业结合，支撑着整个农村的家庭经济。第三是农户既是一个家庭农场的经营单位，也是一个手工业生产单位。我们要记住所谓的工业经济、小农经济，不简单的是农业，而是农工混合、农户混合，农民一方面考农业维持生计，另外靠工业和手工业找生活，这是整个乡村经济的基本形态，而不是简单的从事农业。

第二，这种小农经济的形成是超稳定的。稳定表现在三个方面，第一个就是农民依附于土，土是农民的命根子，包括现在的土地制度改革，有很多人经常说我有时候很激进，有时候很保守。我们晚上想的问题很激进，但是白天操作的时候很保守，原因在哪？土地问题的根子在哪？他是农民的命根子。这样的话，中央在土地制度的设计上是非常谨慎的，因为这是一个传统。农民视土地为命根子，向土地讨生活。这样的话，只要他有一块土地，他基本上就很安稳，只要有一小块土地，农民就有主体。第二是乡村治理，乡村的治理是双轨制，县以下的治理靠乡村治理，所以乡村是高度自治。另外，乡村的秩序靠传统规则的教化来维持礼治秩序。第三是城乡从来是互通的，所以，乡村问题的根源出在哪？就是这三条。当农民跟土地的关系出现问题的时候，乡村就要出事。第二，当乡村的治理不好的时候，就要出事情。第三，城乡断流的时候乡村要出事。中国历史上，从来都是城乡互通的，表现就是农民跟乡土之间的桑梓情谊，最后落叶归根。我当时想着我以后要回去当个乡绅，但是后来发现回不去了。只要有这三条在，乡村就是稳定的，这是第一个特征，就是乡土结构，一定要认清楚这是两个事，第一他是农工农户混合，不是简单的纯工业经济，第二是乡村的稳定。

第二个是什么？整个中国社会被土地束缚了，费老讲的有机结合的稳定性很好，大家要改造。这种超稳定的乡村有机结合，麻烦就是被土地束缚，主要的表现第一个就是离不开土地，因为他不轻易放弃土地。第二是土里土气，我以前读书的时候车都不敢上。第三是以农为主，安土重迁，结果就是土地成为负担，我们经常说，中国是从土里长出光荣和励志的，这是我们的麻烦，中国的土地养了那么多优秀的文明，没有西方那种残酷的过程。但是你被土地束缚了，所以第一个是离不了土。第二个是生于斯，长于斯高度的地域性，这就是我们这次讲的乡村振兴，乡村振兴的核心是我们是有村的，这种村是地域性。第二还有一个是陌生人很难进去，没有陌生人的社会，比如农村的倒插门，三代也分不了他的地，不给他地，你不是本村人，原因就是生于斯，长于斯。第三是小农经济，小农经济非常重要的特征是家本位，我们在座的大家做中国经济的时候，我建议大家非常下功夫地研究家庭经济和个人经济的差别。中国的家本位，这种小农经济是由家本位把持的，表现在中国的土地所有权，中国是最早建立土地私有制的国家，但是这个土地私有制是什么？土地私有制非常重要的特征就是以家庭为单位，不是纯粹西方的那种模式。所以，土地是家内成员以各种不同等级的共有的财产不是个人产权。另外，家庭和家庭之间的土地权利具有排他性，还有就是家庭内的各成员不完全保持同等权利，家庭是整个生产生活的基本，也是财产和财富，这是小农经济非常重要的特征。所以这种特征的结果是什么？结果是在很多农业经济活动里面，看似不合理的，但是以家庭为单位的角色就变得合理了。比如用工，为什么做很多无用功？因为以家庭为单位的。个人为单位的时候就不核算了，成本收益算不过来。老二老三都在干，不干吗？我干了也不吃亏，但是不干了就吃亏了的家里说这老四太自私了，人家正在干活就你不来。

第四是产权，中国的产权很多人说是私有制，但是中国整个农业的耕作制度更本质的产权是以耕作权为单位，表现就是我们到期以后，整个土地制度分成田面权和天地权，田地权是所有制，田面权是佃农的权利，我获得的所有权的地权，整个田面使用，可以转让，田地权只有收租的权利，这个制度安排的结果，导致了人口不断地上升，家庭为单位的制度安排，最后就导致避免西方意义的马尔萨斯陷阱，中国的土地制度不断支撑人口不断的上升，形成了中国非常独特的人口压力，这是三个非常著名的学者做的统计对照。我们到宋的时候已经有了过亿的人口。所以，从宋以来，我们一直延续可耕地资源的增长速度低于人口增长的速度趋势，就是你的资源有限。从明代前期到民国近600您的时间，耕地总量怎账了1倍，人口增长了6倍，中国最后成为一个被土地束缚的社会，实际上就是近代工业化进程受阻。工业化进程受阻，农业承载过多的人口，1952年时，农业人口和劳动力分别占87%84%，你是一个被土地束缚的国家。你的农业怎么支撑这么大的人口？主要是靠提高土地的生产率，但是劳动生产力没有增长。我们6个世纪的粮食产权增长，差不多一半要归耕地面积扩大，其他的是单产的提高。但是，你的劳动的生产率没有增长，所以这是一个没有发展的增长中国乡土最难的是哪？你要从过大的人口压力下，从人依附于土地的社会形态中拔出来，你能拔得出来吗？拔不出来就是一个传统社会，但是你拔出来了也不一定走得通。

接下来我们看我们是怎么过来的，整个乡村社会在近代的时候，没有外力进入的时候是稳定的。但是当外力进来以后，我们第一次受外力就是西方机器大工业进入乡村，出现了什么情况？乡村原有的结构，农工和农户的结构受到了什么影响？所以当西方机器大工业进入乡村的时候，首先破坏的是乡土工业，当西方机器工业进入乡村的时候，我们原有的手工业、住房工业不堪一击，很短的时间内变成了洋火、洋衣，所以首先倒霉的就是乡土工业。倒霉以后，原来是农工和农户互补，当整个乡土工业不行的时候，基本上所有的人就依托于农业了。但是农业在中国的传统社会里面，只是管生计的，不管生活。乡土工业出问题以后，接下来全部压到了农业上。农业管不了生活和生计，然后接下来就陷入贫困了。农民陷入贫困以后，在乡村社会出现了两个事。第一个就是资本外逃，人类乡村里面的土地，城市资本进来，城市资本进来以后，农民贫困以后开始不交租，原来买地的资本就是第一个外逃，首先是资本外逃，第二是乡村的年轻人出走，因为你养不了那么多人。年轻人进入城市以后，接受的教育不是原来的私塾教育了，而是西式教育。所以，农业出问题，农民贫困，然后乡土社会开始出问题，乡村的两大要素开始脱离。一个是资本，一个是年轻人，还有一个是乡村的治理，人类传统稳定的治理结构，就是双轨政策。整个乡村不能完全独立自治的时候外力开始进来，所以乡村整个的治理也开始失序，更主要的就是城乡的有机循环割裂。所以我们现在说的城乡关系，城乡关系的根本在哪？一定是乡村有东西跟城市交换。但是，当乡村的工业被西方工业破坏以后，乡村的农业就不行了，乡村农业既要搞生计又要搞生活，乡村的农业就不行了。所以整个乡村的社会没有东西跟城市交换，于是乡村的有机循环割裂，第一次乡村危机是由外立导致的乡村结构失衡造成的。所以，近代给我们的启发就是乡村有一条衰败链，表现形式首先是乡土工业出问题，而不是农业先出问题，乡土工业出问题以后，农业开始不堪重负，然后农民收入拮据，光靠农业，农民的收入上不去。然后乡村的人口开始流失，另外就是乡村的自治破坏，乡村循环断流，最后是乡村破产。所以，第一个启发就是乡村问题的根源在于结构问题，如果你对乡村的结构认识不清楚，任何外力进入乡村都有可能出问题。这是前面的第一个假设，工业化和城市化的方式，所以你看，我们第一次的问题是受到西方工业影响的。

第二次是计划经济时期，我们还是在讨论能不能把农民从土地束缚中拔出来，整个中国城乡转型的根本是是能不能把农民从土地当中拔出来。共产党从获得政权以后，跟历朝历代最根本的差别在于中国不想继续在一个农业国里面打转，我们要从农业国向工业国转变。但是这回应了我前面的假设，我们工业化的方式，重工业优先发展国家工业化。所以我们看，优先发展重工业就是一个赶超战略，赶超战略的基本制度安排就是扭曲产品和生产要素价格的恢复政策环境。第二是资源的配置高度集中，形成了计划体制。第三是微观经营机制，没有自主权，还有就是人为地压低重工业发展的各项成本，降低重工业资本形成的门槛。但是服务于发展战略的农业，就是农业剩余和低价农产品，满足城市低工资、低食品的供应，工业化的方式非常重要。这种工业化的方式，我们在乡村配套的制度安排就是三项，第一是农产品的统购统销，第二是集体化的人民公社制度，第三是户籍制度。这一套制度安排形成的结果就是说，在整个国家工业化时期，为了保证城市的农产品低价格的供应，农业必须要保证产出，但是我们整个的体制，制度的结果是低效的，你靠什么来保证农业的产出？非常重要的就是我们靠提高单产的投入，化肥是主要增加产量的方式，第二是提高复种次数，所以很多人说农民难，我问我姐姐，你们难吗？开始累得要死，我小时候印象也很深，晚上都在加班，原因就是复种指数提高。道理在哪？跟传统社会一样，就是主要靠提高土地的生产率来支持粮食的生产。所以，在国家工业化时期，农业的功能除了向传统社会，保证基本生存以外，还要保证资本积累。所以，基本上主要靠土地生产，提高了粮食。但是农业生产、劳改生产依然停滞。从1952到1957年，整个农业部门，劳动生产率每年增长1.66%。这一套制度，我们有快速的工业化，我们经常说，计划经济的国家工业化，建立起中国最全的工业体系，这是我们公认的，但是农民呢？我们的集体化制度、人民公社，户籍制度，基本上还是把农民绑在土地上的，不是一个让农民脱离土地的工业化进程。但是1952年的时候，农村劳动力占83.5%，1979年是72.5%，没有变化。

我们回到结构问题，这一套发展方式，乡村服务于城市，农业服务于工业的结果是什么？这一套发展模式的结果是什么？是整个乡村的产业回到近代，近代是农工农户的结构，它是相对稳定的。但是我们这一套发展模式，整个乡村的副业没了，乡村的产业没了，乡村只剩一条路了，就是粮食生产保证城市的供应。这个乡村窄化的结果是什么？农民双重贫困。一个贫困是由于产业结构窄化导致的贫困，历史上、近代上都是一样的，产业结构窄化的贫困。第二是农业本身服务于工业以后，为资本积累，导致剩余被抽取。第三就是农业的绩效不好，农业的生产率，农业的产出都不好，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体制问题。最后是城乡断流，所以这一套结果是什么？第一，整个国家工业化的方式，它不是一个让农民脱离土地的方式，而是使农民跟土地之间的关系被束缚。第二，这一套工业化的方式使整个乡村的结构更加窄化。第三就是从80年代以后，80年代以后我归结为不离土的乡村工业化。在这个时候我们的土地制度上是有松解的，第一就是农地集体所有、农户承包制度，这解决了农业绩效不好的问题。第二，更重要的是就是我们在非农用地上，允许集体土地上的乡村工业化，讲改革的时候可以只讲一条，非农用地在90年代之前，农民的集体土地是可以搞工业化，土地的两个权利都开放了。所以农村的非农用地，1998年之前用地的大头都是在乡村，而不是在城市。第二，非常重要的特点就是东西开始参与工业化的进程，但是他参与的是乡村工业化，从1978年开始一直到1991年，整个农村劳动立的转移到城市的量是这样的。

但是，仅仅乡土工业化能解决农民跟土地的束缚吗？所以我们看，整个80年代到90年代初的工业化进程，我把它归结为三个字，有分工，农业跟工业开始分工，第二是有分业，但是整个乡村工业化是一个不离土的工业化，农民都是在本乡本土，所以这个工业化还是一个不离土的工业化。第二个是结构，80年代和90年代为什么整个农村经济出现转机？非常重要的就是结构修复，就是我们前面说的乡土结构。乡土结构的修复靠三个方面，第一是农业经济多样化，现在你可以搞副业了，80年代改革开始搞的是增加农民的自主权，第二就是把自留地扩大了，所以整个农业经济开始了多样化，多样化以后农民的收入就提高了。第二是乡土工业化，乡镇企业的发展。第三是村民自己建城，大家知道龙岗，龙岗是第一个农民建立的城市，从原来的一个镇，现在变成了一个城市，这都是80年代发生的，80年代发生最重要的特点是什么？修复整个乡土结构，修复的结果就是我们农业绩效的改善、农民的收入提高，第三是城乡关系改善。所以，我们讨论这一段时期的时候，进步在结构修复，但是农民跟土地的关系还是没有从土地上摆脱出来。但是有了分工和分业，还可以参与工业化。

第四个阶段，从90年代以后，中国整个高速的工业化、城镇化浪潮是90年代末开始的。工业化浪潮最主要的表现就是农民开始卷入跨地区的流动，中西部地区的乡镇企业的衰弱，和农民寻找非农就业机会是一样的。城乡之间的大门真正打开，农民的进城是前赴后继，躲躲藏藏。我说一个文件，当时允许农民工进程的政策是怎么出来的？起草文件的老段写了一辈子文件，当时碰到了一个非常伤心的事，他的侄子到北京打工，住在昌平待了两个月，一直躲着，也不敢见他，给他打电话叔叔我到北京了，你到北京你过来吧，他说我不敢过来，为什么不敢过来，怕被他们抓进去筛沙子。后来老段去看他地产生把这个故事讲给江泽民听，所以农民进城，如果这个歧视性的制度不改掉的话，整个中国的城市化农民的权利怎么可以保证？于是就起草了这个1995年的五号文件。农民真正离开图土进入城市，每年从农村向城市转移的人口超过1500万，革命的意义就是农民跟乡土产生分离，农民跟土地的束缚要拔出来。第一，我们工业化的方式，基本上是从80年代和90年代初的农民自主的乡土工业化，转为政府主导。地方政府地方我们特殊的制度，向企业低价地配置土地。第二是靠土地的资本化保证城市建设，土地资本化的过程，实际上有两笔收入，一个就是地方政府的招拍挂的收入，第二是地方政府土地的收入，这两个收入，招拍挂的收储占30%，土地抵押占70%，但是这一笔钱保证了整个中国快速的城市快进。所以中国这些年城市化的钱是怎么来的？就是靠土地的资本化，这是我们工业化和城市化的方式。

大家看，农民跟土地的关系，是不是真的把农民从土地的束缚里拔了出来？重要的变化就是中西部地区的农民开始往南跑，往东部跑，农民开始出村，出村对整个中国的城乡转型是革命性的，乡土中国的重要特征是什么？我去上海读书，这不叫进城。所以我到上海的时候，我母亲给我包了一包泥土，说你生病的时候喝了它。所以，离土出村迈出了一步，但是我们的工业化和城市化的方式的结果是第一代的农民冲出去以后又回村了。这是我们统计局的数据，最深的线是40年代的，第二是50年代，第三就是我们这个年代。真正往城市冲的是80后，我们的这一个工业化和城市化的方式，事实上农民开始离土出村，但是最后又回去了。所以我想，整个中国转型的困境就困在你不把农民彻底从地下拔出来，他就会返回去。所以，第三次的乡村结构危机还是回到结构变迁，你园区工业化和政府主导的城市化的方式，你是可以搞成世界制造工厂的，可以把城市化率搞到60%，但是最后整个乡村的工业化和城镇化提高停滞。停滞的结果第一件事就是农业回报低下，1998年为了保证整个工业园区和城市，我们实现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结果就是整个农业的经济活动更加单一化，包括拆大棚。根源就是乡村的经济活动单一化，单一以后你的农业回报就低了。还有就是城乡要素流动单向，农业不挣钱我就跑了，第二就是农业没有回报，资本跑了，这两个跟近代史是一样的。所以这个跑的结果是什么？整个城乡要素全部往城市跑。要素往城市跑，乡村经济活动单一回报的下降，结果就是乡村衰败。比如河北的蔚县，这是北京的郊区，这是泸县，这是江西，这是四川，结果是什么？乡村的人口不仅是相对量下降，更是绝对量下降，整个乡村村庄的缩并，原因在哪？回顾近代以来的整个转型的困境，实际上有两个转型问题。第一是你是否认识到城乡转型的根本，是把农民从土地束缚中拔出来，所以我们到目前为止的基本思路就是我要工业化和城市化，我要快速的工业化和城市化。但是快速的工业化和城市化采取的方式没有实现农民从土地束缚中摆脱。第二个转型问题，就是乡村的经济活动怎么认识，如果乡村的经济活动等同于只有农业，而且是生存性农业的话，最后就是乡村的结构一次一次被破坏，破坏的结果就是农民的贫困和乡村的衰败。

这是我们整个从近代一直到现在为止转型的两个最具关键的问题，第一个就是我们是有工业化和城市化的，而且我们有快速的工业化和城市化，我们已经把整个中国的工业化搞到美国人都受不了了，你不能说你不伟大，太太大了，墨西哥就搞不起来，我们做成了世界制造工厂，所以我两次出国是最自豪的。第一次是苏联解体，发现我们的钱特别值钱，买什么东西都很便宜，看演出都是第一排。这次去墨西哥也很自豪，看到的到处都是华为，你中国制造是厉害，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的城市也是这样。中国把城市建得像欧洲，比欧洲还漂亮，但是你的乡村呢不行，原因就是转型不能只看工业升级，一定要看工业化、城市化到底给乡村带来了什么。给乡村带来什么的根本标志是看你的工业化和城市化是否到底带来了农民跟土地的关系的疏通，带来农民跟村庄的关系的疏通。如果没有这个疏通，你迟早还要回去。现在有些人说农民就该回去，那你怎么不回去？你这是反现代化。

第三个就是我们现在的城乡中国的结构，结构问题的根源是什么？就是我们现在是否变了？现在的问题在于我们整个结构已经不是费孝通所说的那样了。那我们现在是什么结构？你必须要认清这一点，才能讨论中国的城乡问题。所以我给了一个概念，我们现在是一个城乡中国，中国从结构上来讲，中国发生了从历史以来的一次大转型，这个转型就是中国已经从乡土中国转型为城乡土地。乡土中国的基本特征以农为本、以土为生、以村而治，根治于土，所有的东西都跟土联系在一起，我们现在城乡中国的基本特征是什么？乡土已经变故土，整个农业的方式已经告别了过密化的农业，第三是乡村变故乡，第四是城乡互动。观察整个中国从乡土中国到城乡中国的变革的基本概念，就是农民跟土地、村庄的黏性。所以，城乡中国的结构特征，主要看四个方面，第一个是看农民变化，如果农民还是费先生意义下的搞农业，当工匠的玖那是没有变化的。第二是代际变动，第三是村庄变化，第四是居住变化，我们从四个方面看中国目前的结构到底是否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首先我们看农民，农民最重要的变化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个变化是整个中国的农民，他已经不是一个小农的含义了，表现在哪？我们看收入，现在整个纯搞农业的农民只有10%，完全靠农业收入的只有10%，完全不靠农业为生的农民有20%，但是另外就是以农为主，以工为辅，这种农民在生产、生活和社会方式的选择上，跟传统意义相比完全不一样，农民从均值化转变为异制化。地是代际，代际表现在80后的经济社会和政治的追求，跟第一代的农民工有天壤之别。80后的农民印象里面还有地，你问他说你有地吗？他说家里有，地在哪？他不知道。谁来种？我爸爸和我爷爷来种，他是不种地的，跟的关系梳离，但是他知道他有一块地。第二就是完全不搞农业，所以你看80后的农民不再以农业为生。第三个特征是村庄，一年回一次两次，回去以后他住哪？住在县城的宾馆？所以大家看，春节县城的宾馆是定不到房子的，所以住到县城里面的宾馆开着车第二天回去，然后再回到县城，还有一个就是跟乡村的关系疏远，现在的这些80后回家不讲家乡话，都讲的是非常不地道的地方普通话，死活不讲家乡话，为什么？他要证明他是城里人。这样的话他入城的倾向就加强了，回到乡村的倾向就变弱了。另外就是孩子教育，农二代的小学带在身边，初中到周边比较好的乡镇，高中到县城，所以孩子的去向，孩子的着落基本上就是家庭的着落。第四是居住，我们现在发现，农二代家里有老人的回去修房子，没有老人的房子的去向取决于孩子在哪。比如说孩子在镇上读初中，然后就租一个房子，孩子在高中，我就在县城买一个房子。这些东西基本上表现的是什么？这是农民跟乡村的关系。

农二代跟城市的关系，比如他的生活方式完全城市化，他现在30%的钱还要往回寄，70%的钱在城市里面消费，这算好的。还有不好的是家里给他寄钱的，比如他的工作正式化，所以大家看，像我们那个时候装房子，都是在马路边找建筑工，装我第一个房子的时候，每天跟那个建筑工喝酒，装的时候岳父来了，他说你这个房子装的油漆跟面条一样，建筑工还在喝酒，于是马上就变脸了。但是现在不说建筑工了，还有一个就是收入，他不是追求收入最大化，他说我要相对体面，居住也是这样的，原来调研的时候，一个工棚里面住几十个人，现在不这样了。还有一个就是举家，原来是一个人在外面，这些东西都反映了整个农民已经出村不回去了，乡土变故土家乡变故乡。当然，我希望大家好好研究这个，目前经济学跟社会学有很大的分离，社会学家说刘老师，你的观察只是暂时的，他说社会学来讲，人的迁徙是有一定周期的。你说的农二代还没有到岁数，50岁的时候还得回去，大家可以再观察一下，这是第一个，第一就是农民的分化代际。第二就是我们一定要高度关注这一轮的农村产业革命，传统乡土中国为什么走不出来？非常重要的原因就是农业没搞透。如果我们这一轮可以走到这个程度，农业还没搞透的话，对我们整个的转型要打一个大问号，所以我前面说，转型非常重要的一个特征就是农业一遍遍地搞，13亿亩的土地基本上在流失。这一套体制，最后整个农业能不能走得出来，这是观察这一轮城乡中国最重要的变量。我们从实际调查来看，整个中国的农业正在建立一种产业革命，产业革命的标志是整个中国的粮食安全概念发生重要变革。比如我们的粮食安全，现在是主粮安全，主粮安全带来的结果是什么？结果就是大量不适合做主粮的地方比如到贵州和甘肃，到广西和云南，大量不适合种主粮的地方，农业经济是多样化的，他就不是种水稻和小麦的，他种的是地方特色的水果，种经济作物，这些东西开始多样化。多样化以后，这地方整个农业经济的价值开始提升。当农业经济价值开始提升以后，各种主体就往乡村去，各种主体现在不是地方政府招商引资来的，现在人家也不跟你吃饭了，你也不敢吃了。原来招商引资主要就是吃饭，现在也不吃了，不吃要看你的经济结果。所以你看当工业经济价值提高以后，开始企业进入乡村。企业进入乡村以后，发生了什么变化？就开始出现农业的经营方式开始变化。所以我们讲农业经营方式变化，如果你的主体没有变化的话是变不了的。

企业进来以后，第一件事就是整个农业的生产过程发生了变化。第二就是对于农业经营的质量、品种、标准发生变化。第三是农业的经营规模发生变化，第四就是技术的变化，第五是要素的变化。农业本身的经济价值在提高，这些产业就发生重大的变化，所以农业的产业形态、农业的功能，农业的功能是由什么导致的？城乡关系，城市人对乡村的需求变化。所以这些需求变化以后我们就发现，农业在我们这个阶段是重新提出来的，我们原来的农业就是粮食农业，但是现在我们的农业可能就是一个跟在城市的制造业一样的工业化，这个产业就开始发生重大变化了。这个变化就是农业的功能变化和农业的发展方式变化。所以，有可能在整个中国乡村的要素发生重大变化以后，有可能会出现一场农业的产业革命。如果干得成的话乡村就有希望，干不成的话就完了。

第四个就是村庄，村庄的变化主要表现在什么地方？第一，这一轮的乡村振兴为什么那么重要？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我们原来对农村的理解，就只是一个农业和农民的概念，只有农业和农民的概念。农业就是要吃，但是事实上村庄的重要性我们现在才开始，原来我们的整个研究乡村的基本单位就是农民。但是事实上村庄是整个中国乡村最重要的载体，这是乡村振兴重要的方面。村庄为什么重要？村庄是乡村经济社会、政治、生活所有的代表。所以你进入中国的乡村，不是只有农民，你到西方看看，他们只有农场，然后再有农业。中国有两个载体，一个载体是农民，第二个载体是村庄，村庄将农民、农户，还有就是农民跟其他组织跟国家串联起来的最重要的东西。所以，第一点是村庄不变，我可以武断地说，现在的阶段村庄不变，原因就是村庄的功能不可替代，整个中国的乡村不是只有农民一个载体，而是有两个载体。这是我刚才讲的，尊装是整个乡村所有关系的总和，中国所有的关系不是在农户一个层面，农户也是靠村庄串起来的。第二点就是村庄的分化，我们现在讲乡村振兴，乡村振兴就是大家都在开会搞项目，大家把中国的几十万个村庄搞一遍，这是不可能的，整个中国的村庄基本上是分化的，少部分村庄的活和大部分村庄的衰弱，这是我们现在整个村庄的基本形态，CCTV每天放的都是少部分，大部分村庄是衰弱的，这是我前面给大家放过的图片。所以现在要解决的问题在哪？要解决的问题是怎么让少部分的活得更好，另外是让大部分村庄的衰弱体面地所以现在有人讲乡村是胡讲，进到最后让你热血沸腾，后来发现中央没给他那么多钱，然后他开始沮丧，原因是规律在这里。第三个非常重要的特征就是乡村未来的相对积聚，相对积聚的理由就是原来中国的村庄是以农业为半径的，传统的中国农业是以农业为半径的。传统的农业就是我赶上个牛，另外就是看水，农业经济要不断地管理，像我父亲，一天要去看几十趟，当然现在不看了。所以，农业的集体活动现在开始变化，变化就在于中国的农业现在已经开始以机械为主了。机械为主的活动，半径开始拉长，未来乡村的整合有两个因素。第一是农业经济活动的半径，第二是农一代农二代为了在乡愁，他就是要回去找乡愁，乡愁不一定在老村子，他回去只要有乡愁就可以了。第四个就是乡村的制度，就是传统制度的复活，传统制度的复活是因为乡村的治理不是完全只靠自上而下的，那个规模太大了。所以这样的话，大量的非正式制度在上升，这是第三，就是村庄。

第四是城乡关系，整个结构转变的本质不在于城市化率，所以你看我们原来追求城市化率，真正的特征是城乡之间的互动，所以任何一个国家城市非常先进，但是比乡村很舒服，没有像我们现在城市和乡村那么大的分离，原因就在于产业相关性的本质一定是互动。所以这样的话，我们现在在城乡中国阶段，已经出现了非常重要的变化，先是资本下乡，原因就是在城市没有那么多机会了。第二是资本下乡，然后乡村的机会开始变化，变化以后就是劳动力再配置，所以乡村的年轻人来到北京，也有一些外面的人开始进入乡村，原因是乡村本身的机会在变化，还有大家对乡村的需求在变化，然后就是土地，所以你看我们这次的土地管理法，改的最重要的就是乡村也是一个经济活动场所，也要有土地配置的变化。所以地个非常重要的就是城乡互动的融合，带来了整个乡村要素的变化，这是城乡中国的特征。当然，这些观察还在进行当中，我自己认为，中国确实在发生一场历史转型，但是这个历史转型最重要的特征就是已经告别了乡土中国，每年春节的时候最反感的就是知识分子回来以后写那些哭哭啼啼的文字，我说你到底解决了什么？你要回去吗？你回得去吗？所以非常重要的一个特点就是中国从农民的特征、农业的特征、村庄的特征，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已经进入到了城乡中国阶段。

进入到城乡中国阶段，现在面临着很大的问题就是能不能转变中国乡村产业当中找到出路，这是现在的最根本的特征。给大家放的图是我1988年在贵州做的湄潭案例，这个地方的人均收入是300块钱，这些都是荒山。所以，贵州西部那么贫困的地方，农业也能变得有希望，希望地方也可以做成。所以这一件事，产业项目中国的阶段，农业能不能落成？核心就是我们提的几个概念。一个是农业工业化，农业如果简单的把它当做种植业，就是一个粮食农业的话，这是没有希望的。第二，搞农业的方式如果还是传统农业方式的话也是没有希望的，这就是张先生讲的什么是工业化，工业化的本质是生产要素组合方式，而不简单就是一个产业的改革。第二，什么是转型升级？转型升级就是生产要素组合方式连续发生由低级到高级的突破性变化的过程。所以如果有这两个概念的话，农业和工业有什么差别？所以如果如果发生了生产要素组合方式的变化的话，农业就在工业化。如果农业还是面朝黄土背朝天的话，农业构造没有希望的。农业工业化的过程看的就是生产要素组合方式是否发生变化。湄潭一个县的茶产业做到了将近100亿，县为单位的主导产业，然后大家看它的土地和劳动生产率，都在大幅提高，改变没有发展的困境，只有土地生产的提高，没有劳动生产，这个农业是没有竞争的。所以湄潭的劳动生产率也在提高，烟瘾就是这个地方的农业已经摆脱了没有发展的困境。

第三，我们看湄潭的城乡收入，进入到湄潭，你会感到一片希望，他们的收入没有缩小。为什么会发生变化？我们讲进工业化的过程，工业化的过程最主要的就是政府到底怎么做，我们现在去全国各地看地方政府，就是在那儿做规划，每年做规划，每年变规划，越变这个农业也不好。湄潭的政府进行了持续的制度创新和制度供给，核心就是政府做两件事，第一就是土地到底怎么解决，农业工业化的过程里面，土地带供应阶段到底怎么解决土地制度的问题，第二是你在整个主导产业的选择和发展。所以湄潭第一就是制度创新，最初切断农民和农地之间的不断调整，增加人不增地，减陈不减地。整个一个传统乡村社会被切断是非常痛苦的一件事，农民没有地，这个社会会怎么样？所有人都在担心，所以湄潭做的这件事，增人不增地，减人不减地，新增加的人不给他们分地，但是我们也很担心这个事，做了会怎么样？不做会怎么样？目前为止大家有很多争论，包括这次的土地管理法。原因就是说，增加了人不分地公平吗？这回到了前面讲的转型困境，转型最大的困境就是出去你不切断对土地的束缚，你农业就没希望，所以日本人学了欧洲，我们去日本的时候也是这样我说你们这太狠了，长子和老二老三就不给，刚开始挺难受的，老大再加上地主，那就是农业社会，老大当地主，老二背着包走了，但是几年以后就变了，背着包回来的成了老板，老大说我不能守在这里。但是日本规定，前提是你是老大，你必须把这块地守着，房子还不能破，这是老大的责任。我们当时做了一件非常重要的事，就是你要切一刀，不切的合农民跟土地之间的脐带永远是连着的。最后切下来的结果是什么？你看到数据也会吓到你。1987年了增人不增地，减真不减地，然后这个县有12万人没有再分到土地，听了以后会什么反应？造反。当时我们分析，这12万人怎么过？后来分析的结果是，越无地的人口，家庭收入越高，原因就是越无地的户非收益高，家庭土地越多的人，家庭收入就低。第二，农地越少的户，非耕地越高，就是搞茶的比例越高。这一套制度切的时候你肯定睡不着，但是土地束缚要切这一刀。所以你看湄潭的制度非常有意思的就是配套制度，当农地怎人不增地，减真不减地，减少的人去做什么了？做荒山了，荒山也是70年买。荒山的制度为产业的发展提供了更稳定的制度保障，所以农民敢于在荒山上做产业，那个地方主要就是茶产业。所以我们当时看茶产业非常有意思，你看那个农民对产权的反应，房前屋后的茶是绿的，承包地上的茶是黄的，我第一次出差到了那里，我说你这个茶不一样吗？他说你看出名堂了，但是你像大学刚毕业。他说房前屋后的地你们不会动，但是承包地你们什么时候高兴你们什么时候就收走了，农民对产权的复杂就是这样。房前屋后的茶种得非常绿，当时我们就把荒山70年推出了，搞茶和搞粮食是不一样的，它的投入、稳定性、风险不低，所以这时候茶就起来了。

然后茶企有了新的主体，新的主体来了以后，这个时候农民就变了，他不是原来传统的小农了，然后就开始进行土地流转了。土地流转之后就更规模了，这个地方的产业就做起来了，新主体进入到乡村要有两个东西，第一个就是他的产业有没有保障，第二是他在那个地方的住有没有保障。所以，农地的三权分置为新主体进入和发展提供了条件。最后是宅基地集体建设用地的改革顺应了乡村产业发展和乡村城市化。第二件事就是产业选择，很多地方的产业现在都是政府划的，划的结果是搞不成。所有的地方，为什么搞不起来？非常重要的就是产业的选择太复杂。湄潭只有一个茶产业，所以政府就围着一个主导产业去做，所以我们讲，道理在哪？道理就是整个中国农业的规模经济要靠两个问题来解决。第一个是靠区域控制的规模，所以整个中国农业发生一场区位共治，就是跟90年代不一样了，90年代是什么都干，但是现在是区位共治，每一个产业集中7、8个省。第二就是政府什么时候介入和做什么，政府一定在这个地方先有苗头，然后才能做，不是凭空现在出来的。所以湄潭先找到跟他的资源条件最好的，第二是先有示范村，做了以后政府开始做主导产业的持续培育，面积扩大、农民培育、市场建设、公共品牌培育、质量检查和市场管制，这是政府该做事情。最后是政府要可持续，我们现在的问题在哪？去一个书记换一个产业，原因就是他要升官，我们现在一个主导产业有12到13个省，其实2到3个省就可以做起来了。

第二个就是农民的工业化要素组合的变化，第一个是全县主要以茶为主，第二是农民不往外跑，大量的茶农变成了农业茶企业。第三是乡村企业、合作社、市场、加工厂，这些东西都是在乡村地区发生的。第四个就是科技、机械这些生产要素，最后是市场发展。所以，农业要不要变，这是理念问题，你要充分认识农业工业化是有希望的。第二件事，农业竞争力靠什么？我们很多都是靠不断地扩大规模，然后招商引资，结果是越来越糟。农业的奥秘在哪？你仔细想，比如一般人有土地，整个单位土地回报还下降，其他成本就上升，你的租金、你的雇工、生产资料全部都要上升，同业回报就下降了。所以，只有当你的单位比例回报扩大以后再扩大规模，你的农业才有效。这是寿光的大棚，小屋都是温室大棚，给大家看一个数，一亩地的产量比传统农田搞出几倍，一亩地可以重七轮，一亩可以挣2万块钱，提升回报以后他才愿意做这个事。这是海鲜农场，海绵上飘着房子和网箱。这些鲜活农场是四层，每一层6、7千块钱，他的单位土地回报就上升了。我原来学生物学怎么都听不懂，实际上就是提高单位回报。这是现代的鱼塘，这是芥菜、蜜蜂和鱼虾。这是基本的道理，农业尤其数中国农业的竞争力不是靠扩大的，而是靠提高单位土地报酬，单位土地报酬的根本是企业家在单位土地上的要素，不是刚才小农的。

第三个是乡村振兴的顺序，我们现在所有人都在服务乡村振兴，我们看顺序。最危害乡村振兴的顺序是从村子开始，对整个乡村破坏最开始的就是从最后一个开始，最后一个也最容易做了，搞一个扶贫资金就可以了。我调研的时候看乡村，我说路边的房子怎么还是这两间？他说谁一年下来五六次？领导来一次就走了，这样的话，我们整个乡村里面，如果从村子开始的话结果就是不可持续的，贵州这一轮扶贫，每一个扶贫给6千万，给完以后这个村子有人待吗？我有一个孩子从美国回来，他找了一个北京的村子，第一谈给他打电话，挺开心的，第二天的他说还行，第三天他说要回来。第二个就是人，我们现在大量的人回村，他会回去吗？所以核心是什么？核心一定是先有业务，所以为什么讲，整个转型的根本就是农业能不能搞出名堂，如果不能搞出名堂你把人移到乡村，最后村子肯定是死路。举个例子，这是浙江丽水的松阳，这就是浙江的后发地区，如果它继续走工业化和城市化的话就死定了。但是这个地方有71个国家级传统村落，而且传统村落非常美。这个地方没有被大的破坏，大家现在要去投资的话还有机会。传统的乡村是沉睡的价值，但是你要把这些春水的价值，最简单的路径里面就是在村子里面找村子，所以现在我们最粗暴的就是一笔钱去搞。松阳的办法是先乡村工业化，整个松阳把把的茶产业生态化、有机化，先是产业化。第二是恢复乡村工业，这恢复的是乡村结构。清华有个胶州做出了一种红糖，现在村里的人在做，旅游的人要看东西，另外就是看了以后要在那儿喝，喝了要带走，这个村去年挣了300万，这个红糖工是非常有名的建筑师。第三个就是乡村的文化激活产业，所以很多人在乡村瞎整个，把这些全部抛掉，实际上，乡村的价值恰恰在于它原来的老东西，老东西你不给他做机理的改造也不行。怎么改造？文化结果。最后是集市，两边原来是毛主席万岁，最后在这里做了一个集市，集市每天都有很多人。包括很多旅游者。这是书店，这个书店是在一个特别高的山顶上，这个书店不光是卖书，这个书店就是在这边做很多传统的模块产品的开发。第三个就是民宿，这里的核心是什么？乡村价值之所以沉睡，是因为只有乡村的人自己在这里，我们老家的老人也不的这个东西值钱，他是给外面的人看的。

最后我讲讲城乡融合的新政治经济学，乡村振兴的核心就是顺序。乡村振兴有五件事，第一是重新认识结构现代化，我们原来结构现代化有两级，一级就是乡土中国，一级就是城市中国。北京的知识分子和的知识分子就是在这两级里跳舞，群魔乱舞，永远吵不到一起。讲乡土中国的人骂城市中国的人不懂乡土，而讲城市中国的人说你乡土中国的人土，是落后。但是实际上我自己觉得，结构现代化有三个阶段，一个是费老的乡土中国，终级阶段是城市中国，比如你到了英国，他已经没有乡村了。所以我觉得，我们在整个中国现代化的认识问题上，我们已经开始反思体制上的发展阶段，但是在结构问题上，我们从来没有反思中国还有一个城乡中国。我们把整个中国城市化作为终极目标，中国的结构现代化就是两个阶段，这是极端错误的。中国应该像认识初级阶段一样，中国应该是一个非常长的时间处于城乡中国的阶段，城乡中国的基本特质就是要素的对流、城乡的平等、两个空间的发展，还有一个是主体的平等，不能只有城市没有乡村，没有一个社会是这样的。第二个就是一定要认识结构变迁的方式与结构变迁的结果，所以我们不能单纯地就追求工业化和城市化，一定要研究什么样的变迁方式。所以，中国犯了一个非常大的教训，就是把工业化等同于现代化，忽视了结构变迁的方式，对我们城乡转型的结构影响。第三，一定要重新认识工业化，我现在非常反对中国到了靠内需消费的阶段，我觉得这是胡扯，原因就在于机械地把经济发展分成了两个阶段，农业阶段、工业化阶段、消费阶段、后工业化阶段，这都是吃饱了撑的。任何一个国家，没有工业化没有现代化，甚至我再绝对地说，人一个地区没有工业化，没有现代化，没有一个地区不经过工业化，能够直接进入到现代化，原因就是工业化是整个社会根本的核心，这就是核心在哪，怎么理解的问题。工业化就是生产要素的组合方式，这里有传统的生产要素，也有企业家，也有组织方式的变革。这些生产要素的变化和生产要素的组合转型升级，就是产业升级的过程。

所以这样的话，你这个地方没有这种工业化，但是也会有那种工业化。我们要正确理解工业化，中国现在要解决非常重要的问题就是如何推进中国的农业产业革命，这就是比我们理解工业化更难的一件事，在后发一起推这件事。但是地方政府说，我听的时候很激动，但是不知道怎么做。所以我觉得是不同地方，不褪的生产要素组合方式。第四点，城乡中国如何走向城乡融合，我说了三个字，第一是通，通以后才能融，融了以后才能合。这里的核心在哪？中国城乡问题的根源在哪？城乡两块格局。所以我们现在的一件事就是把城和乡这堵墙拆掉，如果城乡之间的墙还堵着，你就别谈城乡融合了。所以，我们十六届三中全会以来，结果就是城市通乡村，城乡差距更大了，原因就是那堵墙只要不拆，只要打开要素，会更往城市流。所以城乡格局的新阶段先是通，通就是拆墙，墙就是制度上的排除，排除以后通，通了以后城乡才能融，溶化就是要素之间在城乡之间可以跑来跑去，融是生产要素的自由流动，这个生产要素流动最后才是合，合的结果就是我们讲的城市和乡村共同发展，两个空间各干各的，城市起到城市的功能，向屯起到乡村的功能。最后，你要实现整个城乡融合，核心就是体制创新，体制创新的根本就是一句话，核心的一条在于城市一定要向乡村开放。我们现在有两个核心，一个是进城的人凭什么不是城里人？所以农二代已经不把自己当做农民了，未来的农三代天然地就不知道他是农村人。所以我觉得城市一定要向农村开放，如果不开放的话，这将是未来社会未撕裂的最大一块。大家看看香港，我说我明天下午就走了，今天能不能带我去一个地方？我说去深水区，看了之后我觉得不出事才怪，他们交友了一个住户，他住在七八层的楼里，非常小七八层的问题不这一代人住在那里，而是几代人都住在那里，没有办法活，所以中共未来的问题也在这里，农三代不知道他不是农村人，你还让他回去种地。所以，第二就是乡村要向城市开放，所以我们现在把乡村也当做乡土社会，我的很多三农朋友说资本进来乡村，农民都吃掉了，我说你以为农民都是傻子吗？所以乡村必须要向城市开放，城乡打通，才能形成城乡融合的结果。

中国最大的政治经济学就是城乡转型的问题，城乡转型不完成，中国的转型就是一个假转型。但是城乡转型的核心是真正找到结合转型的正确方式，这个方式如果出问题，还是沿着我们原来那条路走，就是朝着城市中国的那条思路走的话，最后城市的问题会越累计。大家想想，我们这一轮是怎么走出来的？城市化率60%了，所有的国家在这个时候是高速发达的，所以我觉得，如果我们整个结构变迁的方式还是一个老思维的话，问题远远会更加深刻。当然，所幸我们现在的机会是中国已经进入了新的阶段，就是城乡中国的阶段，这个阶段是为我们转变结构变革方式提供非常好的机会。我们能不能解决我后面提到的问题？认识上的问题和整个发展路径的问题，这有待于我们研究，进一步地往前走，也有待于我们把这些研究的东西慢慢地说服，但是说服没有用，我说服了30年，最后就是5%的进步，大家一起努力吧，谢谢大家。

提问：如果我们想更多地了解城乡中国的概念，你给我们推荐哪一篇文章？

刘守英：2019年我们写过一些讲土地的问题，学术期刊上我们讲了农民革命，但是题目是论城乡中国，把这个概念换了，费老讲乡土中国也没有概念，但是我觉得乡土中国也要有概念，沉香中国也要有概念，需要很大的工夫来做这件事。

提问：湄潭的茶产业是100亿，茶产业季节性很强，为什么季节性很强，还能做到这么大的产业？

刘守英：茶是一个产业，现在我在想，一个是茶本身是作为一个产业，另外是后发地区，包括粤西。我觉得这些地方在整个农业工业化的过程当中，我自己总结有几步。第一，你选择的产业一定是你那个地方在资源上具有比较优势的。原因就是说，你未来的工业化不是做很大规模，跟我们上一轮的制造工业化比，全世界就是粤西的茶，这就是独特性。第二，一定是先有人试，一个产业打到最后是无数先烈铺出来的，这里有村子，有农民，有经济人，有企业家，很多人都进行了尝试，尝试的结果就是这个地方有这个基因，这是主体基因。第三就是农业的工业化的难度，难在它作为一个产业，它要在地上找，跟你其他工业不一样，其他工业就是一个工厂几十亩地，他跟地的关系不大，但是这个农业工业化第一个难在地，第二是农户，这是整个农业化最难的地方。湄潭在做这件事的时候还是比较成功的，第一就是地这件事，一个地方的产业就是一到两个，千万不能多，一定要形成规模化，有了这个规模化以后，这个地方在要素上才能进行重组。政府在这里有很多事要做，比如土地的流转这些制度，这需要很多的制度设计。第二是跟农民怎么连，这是更难的一件事，难在农业的整个生产过程，产前产中产后，小农是很难的。企业在过程当中，各个环节的标准化怎么去完成？另外就是政府在定标准上怎么去实现，比如湄潭在做欧标，有了标准以后怎么去推？各个生产目标怎么实现？所以我觉得核心就是两个，一个是土地规模化，第二是农民怎么联合起来，第四个是一定要在规模以后企业家再出现，企业家不是先进的，企业家是在市场有机会出现的以后，企业家才出现。最后一个就是市场的过程，市场的过程是个体差别，这是市场开发的过程。这些发生以后，整个农业经济活动开始复杂化，这是第二点，农业的整个经济过程，不能光靠一个产业，而是围着这个产业经济活动开始复杂化的，这是产业的过程。

提问：新的土地管理法颁布之后，土地财政的方式会产生哪些影响和变化？

刘守英：我自己认为，土地管理法跟整个发展模式没有太大关系，因为发展模式已经终结了，我们从2013年就开始了，标志就是再放地也不增长，一个是解决乡村的集体建设用地、还有增地的那一块地有些地不征，直接用，对城市的土地市场，以房地产为核心的发展方式不构成影响。

提问：我觉得中国的农村状况好像很好，我是湖北黄冈的，我们市政府今年7月底到办事处组织了一次黄冈市级的全国各地的大学教授30几个人，在我们老家农村去走访。因为我爸妈还在农村，我的亲戚也在农村，50到80岁的这些农民有两个不好的地方。第一就是现在都是城里到农村比较容易，城里人到农村的资源比较容易。但是有很多水平比较差的，而且是骗农民的东西比较多。第二个问题就是他们很想到中国大城市去看一看，但是除非家里有孩子在北京或者在大城市，一般人来不了。一个是他们没钱第一个是适应不了大城市，我们国家能不能组织帮助这些50到0岁的人，见识一下我们国家？不要让这些城里的低值的企业和小商小贩去骗他们。

刘守英：第一个问题就是这个大问题，尤其是这次乡村振兴以后，包括隔壁的大学教授就去下面折腾，这是非常危险的。骗的问题核心不是骗农民，而是骗政府，主要是我们的很多补贴，大量的补贴还有这些项目，主要骗的那个，农民没有什么太多可骗的。第二件事不好答应你，院落我可以给中央提建议，但是这件事你可以多做一些。

提问：现在农村最大的问题是怎么规划的问题，你参与了土地法的修编，能不能把农村的规划做一下？

刘守英：这个事要小心，乡村是非常多样化的，我现在怕另一方面，就是规划着规划着把乡村规划完了，整个规划界对城市有感觉，但是对乡村基本没概念，所以我们也比太多呼吁这事。

主持人：感谢刘书记给大家精彩的授课，我们下面进行一个简短的结业仪式。我们邀请两位学员代表做一个发言，首先邀请山东师范大学经济学院的院长乔教授发言。

乔教授：谢谢人大经济学院给我这样一个殊荣，也是对我的信任，站在这里我诚惶诚恐，我们的培训班来自全国高校的科研院所、党校，所以有很多是这个领域的专家。既然有勇气站在这个地方，我还是要表达一下我的心意。首先是我代表培训班所有的学员向给我们提供此次培训机会的人大经济学院所有的领导、老师工作人员，表示我们最诚挚的谢意。这次培训我总结了三个特点，第一个特点就是高规格，第二是快节奏，第三是有温度。高规格，我们在理论经济学一级学科排名第一的学府，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的最前沿阵地享受了七天这个领域当中所有大咖带来的一场学术盛宴，所以我认为是高规格的，因为办过会的同志都知道，要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协调这么多大咖，实际上有很多困难，所以在这里也谢谢人大费的精力和心思。第二是快节奏，我们七天安排得紧锣密鼓，很少有快节奏的培训。但是我们整个培训是井然有序的，大家上课的热情，包括老师们讲课的状态，让我们收获非常大。我想我们在讲课的时候，很多老师在探讨什么是中国模式、中国道路，这就是我们中国的模式，这就是我们人大的效率，这就是我们政经人的热情。第三是有温度，这么高规格的培训班，不收取任何费用就已经很吃惊了，没想到报到的时候还有自助餐，没想到还有茶歇，所以真的谢谢人大。人大作为我们政治经济学研究的最前沿阵地，也是行业老大，这充分体现了人大这个领头羊的责任担当和奉献，最后就是感谢人大给我们提供了这么好的交流平台，这么温暖的平台。

第二，感谢所有培训班的学员的相互帮助和友好相处。如果说人大是政治经济学研究的珠穆朗玛的话，我想我们就是分散在全国各地的政治经济学研究和传播的毛细血管，虽然我们没有站在这个领域研究的最前沿，但是我们对这个学科的建设和发展同样有着非常重要的不可或缺的作用。希望我们在这里建立起来的联系，能够一直保持，希望我们这个群永不散场，希望我们在人大的这次培训当中能够通过我们这些毛细血管，在全国各地开花结果，落地生根。

最后是我发出一个邀请我系来自山东师范大学经济学院的，我们经济学院在师范院校里都是新建的学院，但是发展比较快。目前我们有理论经济学习的一级学科硕士典和博士典，政治经济学也是我们重点建设的学科，所以邀请人大的各位领导和老师，还有在座的同学们到山东师范大学经济学院指导工作，最后祝培训班圆满结束，祝大家身体健康、精神愉快，祝大家万事如意。

主持人：下面我们邀请来自边疆地区云南大写经济学院的王副教授。

王教授：我今天想表达三个意思，第一就是感谢，我还是非常感谢在假期当中仍然坚持为我们提供服务的人民大学经济学院的领导、老师和同学们，你们的辛苦付出，为我们提供了很好的学习条件。第二就是感谢人民大学经济学院长期以来为全国从事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老师们提供了一个政经大讲堂的平台。第一届当代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十五次的讲座，参加完之后到今天的第十七次政治经济学系列讲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与实践，我很有幸参加了一系列的学习活动，当然我的收获也很多，尤其是聆听了大师们的真知灼见，在我真实关键的成长阶段，助推了我的成长。第二是感悟，此次系列讲座我进行了一个梳理，六天的学习当中，这次安排的内容主体紧扣亟待解决与解读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前沿理论问题，立足理论与实践两个层面，具有鲜明的时代创新性与现实的实用性。在六天的系统学习当中，我们不仅听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应该怎么看，同时我们也听到了或者是我们学习到了应该怎么干。我们不仅厘清了政治经济学发展的历史路标，同时我们也感到了直面现实、创新研究方法与基本逻辑的必要性。不仅让我们进一步厘清了理论工作者要立足伟大的中国实践，也提醒我们在研究当中应该积极合理地借鉴西方经济学的有益成分。授课专家不仅提振了我们从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重新夺取政治经济学在学术界的话语权与指导权的勇气，其实也在无处不在地告诉我们，如果我们自身不具备扎实的理论内功，这一切可能只是我们的想象而已。我们有机会再次重温了新发展理念的提出，它的过程以及极端的重要性，也聆听了资深的政治经济学们围绕系时代国有企业改革与城乡转型这一系列问题的深入解读。

与此同时，我们也领略了知名学者对于当前中国经济转型的一系列问题，比如宏观调控、收入分配、地方政府竞争，金融体系改革、精准扶贫的思考与真知灼见。授课专家居庙堂之高而思江湖之远大的家国情怀，深深地打动了我们。第三个层面是感恩，我们要感恩我们生活在这样一个伟大的时代，这个时代给我们提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这样一个伟大的理论。同时，它也给我们这些理论工作者提供了丰富而深厚的实践土壤，激励我们在未来的一段时间，为构建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而不断地努力。同时，我们也应该感恩，感恩我们生活在这样的一个时代，这个时代有一系列的很多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前辈，以及后起而知名的新生代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专家和学者。正是他们刻苦求实与乐观的治学精神直面于解决现实问题，让我们明晰我们应该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真正地做在中国的大地上。

最后我还是想借王国维先生的一句话来结束我的发言，他说，鼓劲城大事者，必须经过三种境界。昨夜西风雕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这是第一境界。衣带渐宽终不悔，为异消得人憔悴，这是第二境界。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这是第三种境界。

刘守英：非常感谢全国100多位理论工作者在一周当中的14讲当中，耐心地听我们请的这些老师的讲课。讲的人更害怕听的人不害怕，说明大家真的是来学习的，这也是对人民大学最大的支持。第二是感谢我们经济学院的老师，在假期期间来支持我们大讲堂的工作，来张罗大家的学术活动，我当院长以后今天发了一个微信，有人说大学官僚化，我说我怎么当大学校长第一听就成仆人了？这些老师那么支持我们的工作，另外就是学院的行政人员，假期期间为大家不辞辛苦地鞍前马后，保证咱们大讲堂的成功。还有一个是学生，我上来以后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件事，就是信息的推进，基本上是当天就推出去了，还有好几个学生也在为这次的报道、整理资料做了很重要的工作。我谈几个事，第一，这次我们做这个大讲堂，这是第十讲了，这是一个很好的传承。政治经济学大讲堂为什么一直受到大家的厚爱？一个是我们人民大学在政治经济学一方面的积淀，很多政治学院的老师给我们带来了启发和帮助。我觉得更主要的不只是人民大学的积淀，更重要的是政治经济学的重要性，坚持到第十次，大家还是为了政治经济学而来的，政治经济学是很重要的。政治经济学在整个学科建设上，人民大学首当其冲，在新的发展阶段，政治经济学如何完善体系，如何创新、如何更好地解决中国问题，包括真正形成中国的主流理论，那我们肯定要当仁不让地尽我们的全力。希望在座的各位老师继续关注、支持和我们一起来推动整个中国政治经济学的研究，我们后续还有很多工作，谢老师做了很多的规划，包括今年我们有全国政策政经中心的一系列的活动，主要是推动政治经济学理论研究。另外一个是我们今年还会组织习近平经济思想的论坛，还有五大发展理念，新阶段等等的活动，还有理论和实践的结合。第三个就是我们现在在给学校打报告，就是人才培养，我们要做政治经济学的硕博连读班。我现在现在人才断代很厉害，包括我们人民大学也真的很缺人。整个人才的培养学科体系，未来的教师，这都是我们下一步人民大学经济学院在政治经济学上的一些重大的举措，希望大家一起来探讨怎么样把这个学科做好。

第二个事就是研究，我自己的感受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核心是三个事。第一件事就是你一定要把中国的特找出来，讲了半天你说这是你的特色，那是你的特色，每天跟吵架似的，这应该不是学术研究的规范。中国的特到底在哪？这些特的研究，要从整个人类知识的共识上来研究它的特。我们要有知识共识，这是需要政治经济学人下很大工夫的。整个中国的70年，尤其是改革开放40年，有很多非常独特的地方，但是这些独特的地方到底怎么在理论上概括？怎么去表述，怎么去研究，怎么去对话？第一件事，我自己个人的认识，特到底是什么？需要我们一起做。第二就是研究范式，政治经济学的研究范式，我自己认为要创新，我们整个中国的政治经济学从开始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我们自己改造的这一套发展范式在曾经是非常成熟的。后来西方经济学进入中国以后，尤其是现代经济学的研究范式的不断成长，最后说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是在往下走的。但是现在的问题是西方经济学的研究，是否能够完全讲清楚中国的问题？我自己个人在研究范式上，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现代经济学，我不提倡融合，但是一定要共存，不要形成两种研究范式的排斥性。很多人说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没月了，那你的西方尽可能也没讲清楚中国的很多事。另外一种形态也要注意，西方经济学就是西方的，不适合中国，我觉得这两种极端化的倾向，我们在研究范式上都要注意取长补短，围绕中国问题找到解决中国问题的办法，有一些问题是可以用现代经济学更严谨地进行分析的。所以现代经济学，纯意识形态的东西你可以不箭步，但是纯科学的研究你必须要坚持。千万不要形成两种范式的排斥，要取长补短。

第三就是我们的研究一定要以问题导向，最后你说谁比谁厉害，不要争论这个东西，最后谁把问题提对了，提准了，谁把问题的分析有理有据了，谁解决能力的问题更强，这就可以了。所以，问题导向应该是我们做政治经济学研究的基本方针，就是要实事求是，不要陷入教条，也不要陷入虚无，非常重要的就是要以问题导向来解决问题、分析问题，在问题的基础上形成我们的经济理论。这个发展方向不会跑偏。第四就是要加强对习近平经济思想的认识，习近平经济思想，基本上就是分析问题，还有就是他不断地往前走，他不是那种僵化的东西，所以我觉得，习近平的整个经济思想，从我们人大来讲，我们要研究、总结、提炼体系化的东西。后面的是我个人的看法，供大家参考，我觉得中国政治经济学的研究迎来了最好的时代，但是你不好好做，做不出好东西，也对不住这个时代，这是我跟大家共勉的，在这么好的时代，我们通过政治经济学去研究，为解决中国问题形成中国理论，大家一起努力，谢谢大家。

主持人：政经大讲堂系列讲座就结束了，谢谢大家。